

经济学家

茶座

主编 金明善 执行主编 詹小洪

2006 · 2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总第二十四辑

- ◆ 朱恒鹏 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 ◆ 张晓晶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
- ◆ 田学斌 「骄傲」的经济学家：「谦虚」的经济学
- ◆ 李海舰 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创新
- ◆ 聂辉华 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
- ◆ 王玉霞 刘文彩与周扒皮——张维迎评张五常
- ◆ 陈彩虹 用好「乡导」——取其「地利」
- ◆ 蒲勇健 饮酒博弈：中华酒文化的深层解读
- ◆ 陈瑞铭 关于张闻天的点滴忆述
- ◆ 赵人伟 薛暮桥：一个未圆的梦
- ◆ 王小嘉 看银色与着钱色
- ◆ 詹小洪 文化产业在韩国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道·人道

李海舰

茶人，一曰制茶之人，二曰喝茶之人。

制茶之道，源于制茶人道。笔者曾见一饭馆的筷子包装袋上写道：做菜如同做人，人做好了，菜也就香了。也就是说，产品是人品的物化。作为制茶之人，则是用自己的“良心”赢取顾客的“忠心”，即“以心换心”。这里，亟需完成从“体经济”到“心经济”的转变。过去，用眼去看，用耳去听，用嘴去讲，用手去写；现在，用心去看，用心去听，用心去讲，用心去写。《经济学家茶座》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制“茶”之人用心“熬”出来的。茶中有人，人中有茶，物人为一，这才叫道。人道决定茶道，作为制茶人道，正如《菜根谭》上讲的：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喝茶之道，源于喝茶人道。道行深的人喝茶，能从茶中喝出乾坤；道行浅的人喝茶，则从茶中喝出健康；无道行的人喝茶，只是解渴而已。作为喝茶之人，前者喝茶“养心”，后者喝茶“养身”。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思想，跟着贤人价值就高，跟着庸人价值就低。可见，客体的价值取决于主体的开发，客体的价值取决于主体的品味。这里，客体是茶，主体则是喝茶之人。茶的价值大小、功效高低，则在于喝茶之人，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人道决定茶道，作为喝茶人道，你不识“道”，“道”不识你。正如高人指点：无人品怎知茶中真味，有**道心**方见壶里乾坤。

茶是大自然的造化。茶饮，实际上是某**一地茶**大自然的造化而形成的“精华”和“营养”浓缩到茶里，然后通过“喝茶”的方式，**被**另一地方的人士所吸收了。这里，茶养育了各方人士。而且，只有借助**各方人士**，茶味才浓，茶情才深，茶源才广，茶道才精。一本好书可以改变千万人的思考，一壶好茶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经济学家茶座》应该如此，《经济学家茶座》本来如此。这里，借用一句名言收尾：从来就没有人真正付足书价，人们所付的只是印制成本。



经济学家茶座

(第24辑)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卷首语】

李海舰 茶道·人道/001

【国是我见】

朱恒鹏 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
变迁/004

张晓晶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012

卢周来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道德问题/016

荆林波 政府管制倾向/019

朱玲 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022

【学界万象】

田学斌 “骄傲”的经济学家“谦虚”的经济学/027

本力 宋国青的课和列维特的书/033

李文溥 天堂与人间/036

陆铭 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042

【学问聊斋】

李海舰 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创新/045

叶航 合作效率的三个维度:自由、道德与
正义/057

李俊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经济学解释/063

韦森 中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经济学/067

管清友
张明 世界货币的历史轮回/071

【经济评论】

聂辉华 从人间消失的一亿女性/077

郭梓林 孙茂才悲剧的启示/081

谢作诗 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什么坏事吧/084
陈玉璞

【经济随笔】

王玉霞 刘文彩 VS 周扒皮——张维迎 PK 张五常/086
陈彩虹 用好“乡导”，取其“地利”/090
刘福寿 定州塔·庄子论树·资源观/094
董国政 战争的经济功用/098
叶楚华 关于刘德华的若干经济解释/100

【生活中的经济学】

蒲勇健 饮酒博弈：中华酒文化的深层解读/106
徐昌生 省钱就是节约吗？/113
昌忠泽 寻找对象各种渠道的最优选择次序/119
李仁君 边际收益递减的故事/123

【经济学人】

陈瑞铭 关于张闻天的点滴忆述/127
赵人伟 薛暮桥一个未圆的梦/133
李 钧 和岳父薛暮桥一起生活的日子/138

【经济史话】

王小嘉 看银色与看钱色/144
赵 刚 一条“乾隆年间‘豆腐渣工程’的新闻”
所引发的联想/147

【他山之石】

詹小洪 文化产业在韩国/150
陈 宪 我在欧洲坐廉价航空/153
朱铁臻 柏林纪行/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24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09-04052-8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第 086811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6

E-mail: 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8209802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30×970 毫米 1/16 开

10 印张 160 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 元



我这一辈子： 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

朱恒鹏*

回乡探亲，遇土生老爹。老人年届八十，人生阅历丰富，且读书颇多，又兼关心时事，熟悉政府有关三农政策，村中威望极高。多年未曾谋面，老人见我甚是高兴，老少二人把酒话桑麻，聊得很是投缘。老人讲述一生经历，无意中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笔者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土改：终于拥有了自家的土地

“那可是个好辰光！”说这话时，老人眼中露出少见的光彩，“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我知道，那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这个话题很合我的兴趣，“就从土改开始，给我聊聊你这一辈子经过的事。”

“好！好！既然你愿意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就和你聊聊。”老人也颇有兴致。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分给大家，分得公平吧？”我问道。

“应该算很公平！基本都是平分的，比如，我们家和隔壁长庚家人口一样多，分的田地和牲口也就一样多，都是十亩地、一头牛。”

“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我们两口子合计着一定要好好干，我们相信土地不会糊弄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收成！”

“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的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些。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你很会做买卖吧？”我记起老人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说不上很会，就是比别人多动点脑子。乡亲们都种黄瓜时，我就种西红柿，这样西红柿可以卖个好价钱。等来年大家都种西红柿了，我就种黄瓜，反正不随大流！这样，我们种的东西总能卖个好价钱！”

“很有市场意识嘛！”我恭维道。

“我不懂啥市场意识，只是比别人多动点心思，腿脚勤快一些，多了解些情况。

“农闲时我们两口子就做豆油卖，一是赚点钱，二是可以做些豆饼喂牛，以及做肥料施到地里去。你知道地里施豆饼，地力增加得又明显又长久，比现在的化肥强多了。由于经常给地里施豆饼，我们家地力特别肥，要不产量咋能比别人家高出一大截！

“也就三五年光景，我们家粮缸里装满了粮食！也攒了一些钱，我们又买了十亩地和一头牛，地多了，有时忙不过来，就要临时雇短工。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其他人呢？”

“差别很大，”老人说道，“就拿我们家和长庚家来说吧。土改时同样是分得十亩地、一头牛，我们年龄一样，家里人口也一样，可也就三五年光景，两家的境况差别就很大了。

“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伺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

“两口子还特嘴馋。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说来两口子命也不好。土改第三年吧，他们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重病！治那病花了好多钱，他们哪有钱啊？最终不得不把十亩地都卖了。

“不过还不错，尽管花了一大笔钱，那孩子的病最终治好了！可是病是治好了，他们却一无所有了，成了新兴贫农。说来也是，土改刚刚几年呢，他们家就又没有地了，可是怨谁呢！只能怨老天爷捉弄人，干吗让他儿子得那么一场大病啊。不过说来老天爷挺对得起我，那几年我们全家就没有一个生病的，连头疼脑热的小病



几乎都没有。

“造化弄人啊。”老人叹道。

“这其实很好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首先是父母留给的初始物质财富很不一样，其次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形成的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差异，再次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包括智力和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就是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最后一点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运气的差异吧。长庚儿子得病这事就是一件典型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些决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因素中，唯一可以拉平的只有初始物质财富，就像你和长庚，土改给了你们一个平等的物质财富作为起点，但是其他因素无论如何是无法拉平的，特别是个人的自然禀赋差异始终会存在，并显著地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也非常大，有时甚至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当然，在存在较完善的保险市场的条件下，不确定性可以有所减少，但是却不可能完全消除。在个人的能力能够有效发挥并且个人的收益取决于自己的贡献的环境下，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环境，这些因素的差异必然最终导致个人财富、成就、地位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的环境下，即使物质财富的起点是一样的，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异也必然使得最终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即使最初的物质财富是一样的，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制度下（土地私有制就是这样的制度），那些无法拉平的个体差异必然会导致大家的收入出现差异，并导致最终的物质财富有很大差异。土改后几年你和长庚生活光景的差异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老人没有理会我的掉书袋，等我说完，又按照自己的思绪聊了起来。

二、人民公社：不是我不明白，这政策变化快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让大伙儿把土地、牲口、大农具全部入社，成为公社的集体财产，也就是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不公平。你想想，我们家二十亩好地，两头膘肥体壮的大耕牛、两架地排车，还有那个小油坊，那可都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的，凭什么就成了大伙儿公有的？长庚家什么也没有，也成了公社社员，和我们一起公有我们入社的土地、牲口和大农具，你说这公平吗？”说着说着，老汉有点激动起来。

“长庚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他们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公社。长庚还嘲笑我：‘怎么样？起五更睡半夜，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还不是给大伙儿了？你看我，觉没少睡，酒没少喝，现在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社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像我们这样家里地较多、有好牲口、劳力又多的人家就不痛快了。最初我坚决不同意入社，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不得不入了。有啥法子？可我尽管作不得声，心里却不服气，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公有了？那最初的十亩地一头牛是你政府分给我的，充公就充公吧，我认了。可另外那十亩地一头牛是我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挣来的，你凭什么充公？”

“可想不开又有啥法子？家人劝我，集体了也有好处，大家一起干，只要人人都努力，合作得好，收成不一定比单干差。我觉得可能是这理儿，尽管心里不痛快，最初在社里干活还是像原先在自家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可我发现一些社员不像我这样，他们比在自家干活时出工晚，收工却早，而且活计也干得马马虎虎，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磨洋工，有的甚至还偷粮食。我问一个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他反问我：‘我能拿多少？’想了好久，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100来个劳动力，我每天早出工一个时辰，晚收工一个时辰，一年下来，能多打多少粮食？就算500斤吧，过去自家单干时，这多打的500斤粮食都是我们家的，每天多付出的两个时辰是值得的，可如今在公社里，多打的这500斤粮食100个人分，我只能得到5斤，每天多干两个时辰，一年下来才多得5斤，太不合算了。反过来看，我每天少干两个时辰，多睡点觉，损失什么呢？地里少打500斤粮食，如果是单干，损失全部是自家的，当然不合算，可是现在在社里，我个人只损失5斤粮食。每天多休息两个时辰，一年下来只损失5斤粮食，很合算的。我总算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活，勤快的人得不偿失，偷懒的却没有什损失，那么多人一起干，多干了显不出来，少干了也看不出来，‘滥竽充数’说得不就是这个理吗？”

“从道理上讲，如果能够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贡献分配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可以有效防止这一问题。但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做不到。那么多人混在一起，分散在那么大的农田里干活，**监督起来非常困难**，干活时用劲不用劲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干得认真不认真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监督的干部能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了，看到这里也就看不到那里。况且就是发现谁偷懒了，干部也未必较真，说来他也不过是百十个社员中的一个，多打了粮食他又能多得几斤？得罪了人麻烦却都是自己的！所以，最终记工分的办法就是同样的劳动力干同样的农



活、干同样的时间就得同样的工分，这样的工分制度简单易行，可是这样就意味着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谁还会多干？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大家都学会了偷懒，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都学会了和干部打游击，干部也都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唉，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惜活计不是那些活计，庄稼也不是那些庄稼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曾经那么勤快的农民竟然会变得那么懒！”

“如果把大家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块田地从播种到收割的整个生产过程，最终哪块田地收获的粮食多，负责这块土地的哪组社员分的粮食就多。只要组分的足够小，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偷懒问题。”

“那不成了包产到组承包制、分田单干了吗？偷着试过，也很有效，可上面不允许。”

“嗯，那倒也是，如果一户作为一组，那就成了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了。”我接着说道，“成立人民公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抽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以满足快速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为此必须变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为国家强力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但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严重低效率使这一目的大打折扣。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大的。其中一点就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农业收益分配制度的变化，更根本的是激励机制从而财富创造机制的变化。**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产权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产权制度安排决定了收益分配规则，收益分配规则决定了个人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所有个人的行为合在一起决定了全社会的经济绩效。人民公社这种制度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其严重缺乏促使**其成员努力创造财富的有效激励。”

“最厉害的是搞大食堂的时候，粮食不分给各家各户了，全部送到公社食堂，大家一起吃，真正的大锅饭。1958年那年应该算个好年景，庄稼长得很好，可惜丰产不丰收，好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上来。”

“为什么？”

“大炼钢铁抽走了青壮年劳力，留下的老弱病残应付不了这么多农活，再加上大食堂导致大家大呼隆，反正收获了也不归自己，许多能收获的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是没见过那种情景啊，玉米棒子掉在地上社员都懒得捡起来。你恐怕想象不到一贯节俭的农民会那样糟蹋粮食。”

“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

“饿死人了，上面知道这样干是不行的，开始允许公社把一些地分给社员自己

种,这些地叫自留地,社员自种自收,不用交公,我们私下叫它‘保命田’。务实厚道一些的干部就尽可能多分给大家一点自留地。我们这里的干部较务实,还顺应农民的要求搞包产到户,也就是分田单干,我们家又分到了五亩责任田和一头牛,在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的归自家所有,这很像土改后那几年的情形了,只是田地不归自家所有。事实证明,还是各家单干有效,我们又开始起五更睡半夜了,尽管辛苦一些,可是能够吃饱饭了。这样干着也顺心,你多付出一份劳动,就会多拿一份粮食;你要偷懒,损失也全部由你自己担。为了增加地力,多打粮食,我又省吃俭用买了豆饼施到责任田了,本指望这样地力长久些,最终受益的是自己,可惜我这个人缺乏政治眼光,摸不准政府的脉。长庚那家伙就不像我这样,人家不给责任田施豆饼,那牛也拼死拼活地用,恨不得把它累死。我当时还嘲笑他不像一个过日子的。1966年春天我及时在责任田里播了种,盼望着秋天有个好收获,而长庚竟然不播种,我还奇怪这家伙不想过了,秋天准备喝西北风啊。

“很快,承包制受到了批判,责任田和耕牛又被收回,又回到了生产队一起上工一起收工大呼隆的做法。我再次受到了长庚的嘲笑,说我不长记性,豆饼又浪费了吧,牛又成了给大家养的吧,等等。我也觉得自己很笨,嘲笑自己‘只知低头干活,不知抬头看路’。可是心里很不理解,为什么努力干活、善待土地的我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长庚这家伙还这样教育年轻人:‘小子们,做人可别像你土生老爹那样,拼死拼活地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地是伺候得很好,牲口也养得好,可是到头来自家也没有多得到什么,日子过得还不和大伙儿一个样?你们看我,哪儿舒服咱躲哪儿,觉没少睡,活没多干,最终怎样?日子一点也不比土生家差。’村里的年轻人对他的话很以为然,个顶个地比着谁懒,都认为我的做法挺傻。”

“是啊,对私有财产的随意侵害,关键还不是对当事人生产积极性的严重打击,而是给年轻一代形成的负面信念和社会预期,那就是勤奋劳动、诚实经营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培养的不是一种积极创造财富的社会信念,而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分食别人蛋糕的心态。换句话说,严格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不仅仅激励当事人诚实经营、努力工作,还鼓励一代代的年轻人形成良好的人生信念,它既提高当期的社会效率,提高财富的积累速度,还会促进未来的效率提高和财富积累。短短二百余年,美国就积累了那么多的国民财富,成为世界上老百姓最富、国力最强的国家,良好的私人财产制度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正是这种受到严格保护的私人财产制度和不容置疑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信念使得美国连



绵不绝地出现福特、摩根、斯隆、巴菲特、盖茨这些不仅个人发家致富、而且极大地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企业家、投资家。”

等我说完，老人继续说道：

“幸亏这次没有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的田地里大家依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可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那时攒下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多少用处。现在大家都用到了自留地里。有点好肥料大家也尽可能偷偷地施到自留地中。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干到七八点时再到生产队的地里去和大家大呼隆，下午太阳还没下山就收工，然后跑到自留地里再干上一个时辰，这样每天在生产队里省下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了自家的自留地中。不止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这样做。我们曾经估算过，自留地的亩产量大约是生产队亩产量的五六倍。幸亏有了自留地，否则难保不再饿死人。但我们真的想不明白，给自己干活大家这样努力，为什么非要让大家一起大呼隆呢？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让人人有吃有穿的嘛。”

三、家庭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就这样一直过了十多年，尽管没有再饿死人，可是大家的日子挺艰难。穷则思变，有些地方又悄悄搞起了分田到户家庭承包制，听说提出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初上面也不允许，可是逐渐的政策改变了，好像是1980年，中央文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责任制了，我们这里再次开始分田到户，我们家又分得了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口鱼塘，长庚家也是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片山林。记得最初的承包期是三年。说实话，已经吃过两次亏了，这次我们都担心政策还会变，所以这次我没再施豆饼。豆饼这样的好肥料还是用到自留地里，责任田中多用化肥。用化肥当时增产效果好，只是用久了地力会下降。承包的鱼塘中我也没敢放鱼苗，怕花了钱长大了再被充公，而是拼命地把鱼塘里的鱼捞上来卖掉，我当时的想法是争取在政策改变前把鱼捞光，一条也不留下。长庚的做法和我一样，还夸我终于长记性了，他把承包林中的大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材，小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柴，你看看，这哪像过日子的样？”

“你们这叫掠夺性经营，听说当时有人以此为证据反对家庭承包制，说这种掠夺式经营模式证明了农民的短视，说什么小农经济没有前途，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

“他们那是瞎掰。农民一点也不短视，你只给了我三年的承包期，我怎么看长远？况且此前政策反复变。我们短视是因为没有给我们一个能够追求的长期利

益。两千多年前的孟子都知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什么是恒产？可以长期拥有的财产！什么是恒心，着眼于长远好好过日子！不让我们拥有恒产，我们怎么会有恒心？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不如，就会在哪里瞎嚷嚷！”说着说着，老汉又有点激动。

“是啊，这么短的承包期以及政策要变的预期根本不能激励农民爱惜地力并对土地投资。经济学家相信：‘只有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没有不合理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选择。’农民的理性程度丝毫不弱于别人。许多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其实都是农民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你们涸泽而渔，不是不理性，而是没有长期利益可以追求。”

“我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法子，这是一种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做法。可是我们已经吃够了政策多变的亏了。我们又左右不了政策，前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能这样做。

“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情况不一样了，1982年年初中央说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后来文件又明确说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再后来更是改为30年以上，这次看来政策不会变了。

“望着空荡荡的鱼塘和光秃秃的山林，我们哭笑不得，看来老皇历不管用了。我赶紧买了鱼苗放到池塘中，长庚也买了树苗栽到了山上，我们又开始精心伺候土地和耕牛。它们也没有亏待我们，靠着这些承包的责任田、鱼塘和山林，我们盖上了砖瓦房，过上了天天吃白馍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露出了笑容。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看来这种土地制度是很好的了？”我知道这个问题争议很多，正好了解一下老人的看法。

“那倒不见得。要我说家庭承包制取得这么大的效果，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太差了，只要能改掉它，几乎怎么改都会提高效率。”

“那你觉得哪种土地制度最好呢？”

“这事说来复杂了，过段时间你不是还来吗，留待下回再说吧。”



能否超越经济增长？

张晓晶*

最近去浙江调研，同去的大多是文史哲领域的专家，而研究的问题也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颇引起自己的兴趣。一路上大家谈兴很浓。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便是，经济学家们天天都在谈 GDP、谈经济增长，似乎这就是一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这样下去社会将变成什么样？人类的价值追求哪里去寻找？言外之意，颇有些指责的味道，似乎是经济学(家)把世界搞乱了。

我只好赶紧解释说，首先，增长只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凯恩斯就曾这样断言，从有史记载的最早时代——例如上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到 18 世纪初期，生活在地球上的文明中心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改变。而通过现代增长理论以

及麦迪逊的千年史研究，以及其他更多的经济史、社会史资料的发掘，增长始于 18 世纪的看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不过接下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又在追求什么呢？是不是增长目标之外的更多的精神价值呢？大凡看到物欲横流，人们总会想到过去。看到今天的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 GDP 竞争，人们也一定会想起过去可能有的美好时代。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维吉尔的田园诗，都成为某种标志性的回忆。其实，大家的想法不过是，那个时候人们或许也过得挺好，尽管物质生活不是很丰裕，但是精神很富足。毕竟，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却可能是丰富多彩、高尚而富于精神价值的，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辨，绝没有今天这么“物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质”，这么“庸俗”，这么“唯增长”。这种经济生活与文化价值的分离，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那些追求精神价值的仍然是那些富足的贵族或奴隶主。如果我们从大传统再到小传统，从帝王史、精英史再到平民史，我们会发现，没有物质的发展，精神的追求是空洞乏力的。

不过，我的那些文史哲的同行们仍然追问：为什么要增长，为什么天天要增长？增长就是一切吗？搞市场经济，似乎也是为了更好地增长。增长成了一个魔咒。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无论你怎么强调“仓廩实而知礼节”，但显然不能只追求物质生活，只追求经济增长，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追求。

我回答说，即便很多人想这么做，也迫于市场化、全球化的压力而不得不以增长为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一个远离市场化的群落，这里的人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的价值取向可能完全是精神的（有人认为以前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市场的边界在扩大，市场在侵蚀这片土地，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了市场化，人们有了比较，原有价值标准开始分裂。市场化之下，哪里有净土？这里绝不是说市场化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大家的价值标准），更不是说市场化导致了价值追求的堕

落，只是强调，经济市场化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正在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变成一元价值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胜过一切。一个群落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明也是如此。在存在着全球竞争的压力的情况下，唯有增长，唯有强大，才可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经济力量在统一全球的价值观。无情的经济逻辑也驱动着世界发展的进程。

有人感叹说，在欧洲希腊尽管经济发展很落后，但人们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这不是打破了经济增长决定论吗？不过，我想说的是，希腊人或许正在苦于自己的不发展呢。

这便是物质的今天带给人们的困惑。

二

“唯经济增长”确实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中国唯GDP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了，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将增长而是将民生幸福作为最终的目标。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超越增长，因为增长是民生幸福的必要条件，正是经济增长与物质富足，让我们摆脱了自然的束缚，摆脱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从此，人类看到了光明，正如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火种。



此外，增长还能带来更多积极的道德后果。哈佛大学教授本·弗里德曼在刚刚推出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努力为经济增长正名。增长不但没有带来不良的道德后果，相反，我们所期望的自由、民主、宽容等高尚的道德，正是经由增长才能带来。

书中指出，我们应该继续为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奋斗。因为追求在财富上超越我们的父辈，这一过程在道德方面的好处如同物质方面一样多。比如，这会对社会上层产生一种财富效应。凯恩斯说，某人对其银行账户采取“暴政”，远比他对邻居这么干要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伦敦的财富增长当年是怎样地吸引了英国贵族，使他们放弃了其领地上的军队和彼此间的战争，而一心在伦敦社交界和宫廷占有一席之地。一个正在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其上层会将精力集中于获取财富，即对物、对自然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经济增长就像正在行进中的自行车，只有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而一旦停下来，后果就会很严重。这不是简单的就业减少、工资下降或者生活水平不如以前这样的经济后果，这同样会威胁到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宽容等道德后果。比如，日本在经历 20 世纪 30 年

代的大萧条之后，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暗杀和政变，日本的立宪君主政体由此蜕变为法西斯军事独裁。西欧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没有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就可能不会有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的专政，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多达 4000 万欧洲人的死亡。

前一阵子看到的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也指出，如果 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和整个世界，不止 10 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显然，这个“健康的中国”就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力的强盛。这会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平衡”，从而更加平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道德后果。

因此，弗里德曼总结道，如果你想要得到各种非经济方面的好处，比如机会的开放、宽容、社会稳定、公平、民主等等，经济的快速增长能让你远为轻易地达到目标。

三

除了增长经济学，现在又有了快乐经济学。学者们想衡量增长到底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快乐。因此就有了很多的国际比较。比如一般认为欧洲人的工时要少于美国人的工时，欧洲国家比美国提供了更多的社会福利，当然，结果可能是美国的增长要快于欧洲，美国经济呈现出比欧洲更强的活力。不过，欧洲人似乎更闲适更快乐一些，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现在成了很多人的追求。我们没有把握认为欧洲模式一定能够引领世界潮流。不过，当我们跨越了这样的物质积累阶段，生活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凯恩斯因此在他的《劝说集》中这样明确说道：“当财富积累不是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改革。我们将能够摒弃许多假道德准则，它们已经压迫了我们 200 年。由

于它们，我们把可耻的人类品质赞颂为最高的美德。我们将能够有胆量探寻货币动机的真正价值。不同于把金钱作为享受和生活现实的手段来热爱，把金钱作为财产来热爱将被认出本质，也就是一种病态，一种半罪恶、半精神病的倾向，人们震颤着把它交给精神病专家。那时我们将摆脱并最终摒弃所有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利益及惩罚分配的社会习惯和经济现实，目前，不管它们是多么可耻和不公平，人们还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它们，因为它们在促进资本积累中具有巨大作用。”

凯恩斯为我们勾画了未来道德世界的美好图景。但他毕竟是经济学家，是世俗哲学家，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还无法摆脱物质积累；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还无法超越经济增长，尽管我们有理由一直憧憬着那个美好的道德国度的到来。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卢周来*

企业除了以利润为目的之外，还应该兼顾社会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但以往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企业兼顾社会责任，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既然是道德问题，那么，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软约束”。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讲社会责任，但完全是企业领导人自愿的事。换言之，如果企业不讲社会责任，也并没有什么过错。

但这种说法最近在西方企业界受到了挑战。在美国，托马斯·唐纳森和托马斯·邓非是企业伦理学权威，两人都任教于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前者担任过美国企业伦理学学会会长，后者则担任过沃顿学院法律研究系的主任。而且两人都曾经为许多跨国公司讲课并任商业顾问，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摩托罗拉公司、壳牌国际公司等等。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他们的一本新著 *Ties That Bind: A Social Contracts Approach to Business Ethics*（《有约束力的关系：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方法》）中首次提出，企业必须将其社会责任作为硬约束，必须将遵守社会伦理道德与遵守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事情还要从两位企业伦理学家帮助壳牌国际公司进行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说起。

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壳牌国际一直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三角洲推行一项合同额达 36 亿美元的天然气开采计划。一些尼日利亚人认为，这项计划将对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生致命破坏，就组织起来对这项计划进行抗议。尼日利亚政府为配合壳牌国际的这个计划，不顾当地百姓抗议，而组织强行拆迁与开发，于是，抗议演变成暴力事件。在暴力事件中，有几位土著男子被警察射杀，有更多的抗议者被抓。在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尼日利亚政府竟然对被抓的 9 名抗议者判处死刑，并且不顾国际人权及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很快对 9 名抗议者执行了死刑。

* 作者现居北京。